

移民岁月

第二十期

YI MIN SUI YUE

风雨年华

——苦涩与快乐的人生经历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二组

同心要建发电厂，樊洪庆老人的夫人马凤英留在同心县公交办公室，等待着到吴忠来学习。到吴忠电厂学习的人较多，有学习无线电的，有学锅炉的。她说：我是学化验的，这就赶上倒霉的时候了。我的那个女师傅，是兰州化工学校毕业的中专生，是右派。她的脚走路有点毛病，对我来说就难了，我刚从学校出来，面对右派近不了不行，亲了不行，远了也不行。向人家学习，人家是知识分子，你得尊敬人家。你过于亲近了，别人会对你有看法，这挺难的。师傅一来就去劳动，黄河发水了也要去劳动。有一天下雨，师傅的脚不好使，她让我帮着带两个馒头。我要到一个老远的地方买饭，到那吃饭，我遇到所长索云龙。所长把我给批评了一顿，说你还给右派带饭。回来我就哭了。

樊洪庆一旁补充说：我也去了，那时候我在吴忠，同心要建电厂，因为那个时候同心没电，点的煤油灯，他们一天吃两顿饭，早晨集体学习，九点钟开饭，中午不休息，下午四点钟吃晚饭，晚上有工作了还要点着煤油灯办公。同心县是为了想发电，享受一下光明，所以就派她们来培训学习。当时马永德是同心县副县长，写信反映情况，需要建一个小电厂，希望发电。结果呢，一

个因为没有黄河水，一个是1962年自然灾害，就放下了，也没建成电厂。同心只搞了一个汽车头发电，天黑发电，晚上12点熄灯，同心县政府就这么解决了照明问题。那时候我还在吴忠，她去学习就在吴忠电厂。

马凤英还想说一下吴忠发电厂的事。她说：我跟师傅去防洪，清晨5点就得出发。一个人拿着铁锹在渠上走，看到水涨了就赶紧喊一声，大家就一起去看。下雨路滑，还把我的脚崴了。樊洪庆补充说：她到那学习正好赶上吴忠防洪，就把他们学习的人拉出来补充上了，那是因为领导看他们这些来学习培训的人不是本企业的骨干，就派出去防洪了。她在这学习的师傅，文化程度不低，化学方面懂得多，发电厂的水要软化处理，普通的水有水垢，到时候锅炉烧到一定程度就会爆炸，所以必须要把水质软化下来，不结垢锅炉才能延长寿命。她的师父是个右派，人家把她的师父和她派去吴忠古城湾，就是现在的古城乡，正好是黄河的大湾子。她去防洪的地方，正好在这里。她们晚上值班，因为防洪背着背篋，下雨就把脚崴了，现在还有点后遗症呢。

1958年五一过后，马凤英到吴忠学习，国庆节后回到了同心，开始大炼钢铁

了。马凤英说：我到土坡铁厂参与大炼钢铁劳动。在这里一同劳动的还有北京地质学院的同学，两个女生，一个是四年级的，一个是1957年刚考上的。我们3个人住在一起，住窑洞也挺好。在土坡铁厂，就是起得早点，跟当地村里砸石头的

女同志在一起。有时候，她们还跟我一起玩，把她们的盖头也给我盖上，衣服给我穿上，跟她们打成一片，可高兴了。后来，地质学院那两个同学要回去，我也要回去，领导说你不能回。我们住的那个窑洞没有门，就挂一个帘子，我说不待了，就跟着那两个人一块回了。回去以后，在发电厂没有太多的事干，主要是看电表，做记录等。

在同心的工作经历，马凤英还是怀念的。她说：没有人能把这段工作生活经历写出来。从大方面说，我觉得同心的干部都挺好的，能在那么艰苦的地方工作。

吴忠工作的经历，共同的地域环境为二老提供结缘的机遇。1959年国庆节，二老在吴忠喜结良缘，但什么都没有。当时在吴忠电厂上班，上夜班很苦。

二老婚后的工作生活，也是我们想要了解的。樊洪庆说：1960年，正赶上低标准，那个时候宁夏提了个双反，反地方民族主义，反坏人坏事。坏人坏事是啥呢，就是说社会主义不好，大跃进

不好。上海、杭州和宁夏永宁县，来一批知识青年，修西干渠死了一些人，还跑了不少人，因为吃不饱肚子，抓住以后就是坏人坏事受批判。现在宁夏西干渠，都是靠人工修起来的。这一批判就扩大化了，偷一个馒头，偷一个饼子，都要批判，有的还判刑了。个别人受不了，找同学、朋友借几个钱，搭火车都跑回去了。

具体到二老的生活，他们没有房子。孩子要出生了，没办法，就回北京在亲戚家里生的孩子。樊洪庆说：当时反坏人坏事的社会背景，有人说我老伴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吴忠受不了孩子，还要跑回北京去生。吴忠没亲戚，没房子住。北京有一个舅妈，户口都转到农村了，跟资本家一起下放到乡下了。生孩子这事，也要作为坏人坏事批判。生到吴忠市委，市委没批，算是躲过去了。

马凤英说：在电厂上夜班，孩子差点饿死，我就到市委反映，希望能调到学校。还好把我调到吴忠市东塔寺小学，我到那以后，吃26斤粮，这时还可以，没挨饿。1962年，国家实施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政策，我又被调出学校，丈夫樊洪庆也调到石沟驿煤矿，我也到了石沟驿。在那里，我又生了个女孩。

（薛正昌 陈建伟 整理）

宁夏京剧团当家武生——高韵笙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三组

宁夏是个移民省区，新中国成立后，大批有志之士怀着建设边疆、献身边疆的梦想，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集这里，用他们的青春和充满激情的创造力，为改变落后的旧宁夏、建设新宁夏贡献智慧、洒下汗水。

他们很多人在来宁夏时都是唱着充满激情的歌。“哪里需要哪里去，那里就是我的家。”在来宁夏时，共同的特点就是——打起背包就出发。

当年那些“打起背包就出发”的年轻人现在已经不再年轻，他们在宁夏扎根，有了第二代、第三代。流逝的岁月没有磨去他们当年的记忆。回望从前，他们用智慧和激情绘出的画卷十分壮美，也饱含了他们对宁夏这片土地的眷恋。今天，让我们静听支宁人高韵笙讲述他过去的故事。

高永麟（高韵笙），祖籍山西，1929年生于北京，京剧高派创始人高庆奎之幼子，生长在京剧世家对京剧的唱腔武打耳濡目染。高韵笙8岁随父学戏，先后在其父主演的《汾河湾》《三娘教子》《明末遗恨》《铁莲花》等戏中扮演娃娃生。10岁随父到“中华戏曲专科学校”学戏，父亲高庆奎任教师，他在永字班学戏，攻武生。这所学校成立于1930年，当时在全国京剧界名气很大，创始

人有京剧大师程砚秋、戏曲大师焦菊隐、教育大师金促桢等名师。两年后戏校停办，又转入“富连成”科班，师从王连平、茹富兰、刘喜义学戏。1948年参加东北军区政治部京剧团。1954年调军委总政京剧团。1955年随团集体转业成立中国京剧院四团，先后出访苏联、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埃及、苏丹、叙利亚、埃塞俄比亚、印度、缅甸、阿富汗、黎巴嫩等国演出，并获得波兰“金十字”勋章、罗马尼亚银质勋章、捷克斯洛伐克“反坦克英雄”奖章。1958年随团调往宁夏。后因腿部受伤脱离舞台，相继在宁夏戏曲训练班、宁夏京剧团、宁夏艺术学校任教，并曾任宁夏京剧团艺委会主任、顾问。1985年离休。

在高韵笙家门前，我们最先看到的是一块光荣军人的牌子。高老曾经是位革命军人，两次参加过抗美援朝慰问演出。

高韵笙：中华戏曲专科学校全部招收的是10岁到14岁的学员，学制八年，因种种原因，这所学校到1940年停办，尽管只存在了十年，但培养出了德、和、金、玉、永五科300多名学生。很多学生后来都成为国内知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或各地京剧团的挑梁台柱。首任校长焦菊隐，是著名的戏剧家，话剧《茶

馆》就是由他导演的。

因为父亲高庆奎当时在北平的京剧界已经名声很大，也受聘在该校任教，将已经有了一定京剧戏曲功底的高韵笙带入学校，成为中华戏曲专科学校的科班生，专攻武生，按学校排名规定，归入“永”字班，艺名高永麟。

高韵笙：这所学校两年后停办了，我们也成为中华戏曲专科学校最后一届专科毕业生。在校学习的这两年为我以后或者说是一生的舞台艺术打下了扎实的功底，更重要的是培养出了我对京剧艺术的更深度理解和热爱，可惜学校两年后停办了。停办后我又转到了京剧大师富连成的科班里学戏，富连成科班在当时的北平影响也很大，京剧大师梅兰芳也在这个科班里进修过。这个科班与原来的学校有些不同，除了每天学戏练功外，还要兼学文化课，唱、念、做、打等舞台功底全部涉及，根据你的特长和条件，术有专攻的进行培养，那时候我练功很刻苦，武戏最为突出。我们有了很多登台演出机会，舞台上刀、枪、剑、戟、鞭样样全能，斤斗、旋子也漂亮，再加上念白字正腔圆、嗓音如洪，富连成大师特别喜爱我，也给予我亲传，上了很多戏，名字也常常挂在戏牌上。

抗战后期，富连成科班解散，我又到了一个专业水平相对较高的民间剧团，飘荡在北平、天津地区和东三省，一来常常有演出不会荒废学来不易的舞台功底，二来也要过生活。

1984年底，高韵笙所在的剧团飘荡到了东北，当时解放战争胜负的大局已经明朗，东北战场解放大军如秋风扫落叶，先后解放了长春、锦州、沈阳等多个大城市，慰问胜利的部队官兵成为剧团演出的一个重要任务。在一次慰问演出中，高韵笙这位富连成科班的当家武生被一位懂行的野战军大首长看中，直接入伍。由于对京剧艺术的独到理解和肯下功夫，不久就成为部队文工团武生头牌，也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

高韵笙：要说改变我人生经历的几次机会全是偶然，第一次偶然在1948年，在慰问东北野战军时被一位首长看中，这位首长对招兵的人说：“这个小伙子是富连成科班出来的当家武生，把他招进来，日后定是个名角。”

就这样，我成了东北军区政治部京剧团的一名解放军战士。参军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一是有了很强的组织纪律观念、二是有了人生的理想信念、最重要的是树立起了艺术为人民服务这个根本。（薛正昌 高银生 马君武 整理）

斯诺在红色“西北角”

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苏区临时首都保安（现陕西省志丹县）采访了毛泽东并搜集到有关红军长征的第一手资料后，本打算到南线采访。但当他担任翻译的红军战士建议他去宁夏前线采访正在接应红二、四方面军入陕的红军西征部队。

斯诺后来说：“我幸亏接受了他的劝告，我要是没有接受他的劝告，在离开保安时，仍旧不明白红军不可战胜的声誉从何而来。”

毛泽东同意斯诺到前线采访，并在7月9日派出一个骑兵小分队护送他经吴起镇赴宁夏，同行的还有美国医生马海德。约20天后，斯诺一行到达红军西方野战军司令部所在地——预旺堡（今宁夏同心），受到红军的热烈欢迎。彭德怀、聂荣臻、左权等在一个场院上为他们举行了欢迎大会。斯诺即席发表了热情的讲话，红一军团4师还挑选出二匹缴获的上等战马，送给斯诺和马海德。

会后，红军政治部把斯诺讲话的摘要，用毛笔写在驻地杨家堡上房的墙壁上，此墨迹一直保留到上世纪60年代“文革”前。

斯诺与彭德怀同住预旺堡简陋的司令部院内，并对他进行过多次采访。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谈到了对彭德怀的印象：“谈话举止上有一种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的作风，这是中国人中不可多得的品质。虽然蒋介石的飞机常在红军前线扔传单，悬赏10万缉拿彭德怀，但他的司令部门前只有一个哨兵站岗，上街也从来不带警卫。”

经彭德怀介绍，斯诺还专程到下马关对同样被蒋介石悬赏10万通缉的红十五军团团长徐海东进行采访。徐海东向斯诺介绍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国民党一共杀了徐家27个近亲、39个远亲，共66人，只留下一个在红四方面军的哥哥。”

后来，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专门写了一章《红色窑工徐海东》。

时任红二师政委的肖华为斯诺的采访做了周到安排，使他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在根据地内进行采访。可以到连队“列宁室”去看墙报；参加连队的政治课和战士的文化学习；可以自由地和农民进行交谈……

9月1日，斯诺随彭德怀离开预旺堡向西转移到吊堡子，几天后，他结束了在宁夏为期40多天的采访。

后来，斯诺把在宁夏的所见所闻都详尽地写进了《西行漫记》中，使国民党反动派对红军的一切污蔑和指责都不攻自灭。尽管当时他看到的仅局限于中国“西北角”，这块人口稀少荒凉、被国民党强大军队重重包围的红色根据地，但他已经预感到“红星照耀中国”，甚至还会照耀全世界。（据《人民政协报》）

曹动之烈士生平简介

孙国标

曹动之，原名曹开诚，1906年生于陕西省横山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15年进毛乌素小学读书，1920年考入横山县立高小。

他于1925年在横山高小和高岗等一起，发动了数百名同学反对当局专制压迫、反对旧学制，在人民群众的声援下，迫使当局撤换了专制独裁的县长、校长和学究，获得胜利。为此，反动当局开除了他的学籍。随后他来到靖边县，在镇靖小学读完高小，考入榆林直属中学。1926年在榆林中学因参加“学生自治会运动”，再次被开除学籍，武装押出榆林城，遣回横山。

1927年，曹动之由地下党负责人钱达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横山县党的特别支部书记鲁奔离开横山，曹动之接任特支书记。这期间，他以教员身份，一面借教书宣传革命道理，一面秘密组织游击队。同年底，在靖边西沟创建了十余人、两支枪的游击队。1928年，他领导这支游击队在西沟一带打富济贫，发动群众抗粮抗捐，扩大游击武装。1929年，游击队转到伊克昭盟的乌审旗活动，伏击了乌审旗反动武装第十二团，开辟了游击区，播下了革命火种。

1930年至1931年，曹动之做兵运工作。他受命打人国民党军驻靖边宁条梁高世雄骑兵团。在高部争取和组织了一个连的兵暴。暴动后一部分人组成骑兵游击队，活动在伊盟。

1934年，曹动之领导的游击队参加了陕北红军，编为二十二支队，曹动之任支队长兼政委。在乌审旗、城川与三边交界地区，游击队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发展革命力量。1935年春，他又和吴亚雄组建了蒙汉骑兵游击队。他率领这支骑兵部队驰骋在长城内外、绥蒙草原，勇敢战斗，屡建战功；同年8月攻打横山，9月解放了杜新庄，10月打下了黑峰子，受到上级的通令表扬，称他们是“英勇善战可歌可泣的人民骑兵”。在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武装的艰苦日子里，曹动之不惜献出家产，买枪购马，建设部队。

1936年，党中央为了团结少数民族共同抗日，在定边成立了工作委员会，高岗任主任，曹动之、赵统儒等同志参与领导，开展了蒙族地区的抗日运动。

1937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曹动之先后任乌审旗工委书记兼骑兵团、团长，伊盟工委委员兼军事部部长等职，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建立民族革命武装活动。他曾多次带伤奉命组建蒙汉骑兵游击队，给主力军输送干部、战士。曾协助齐金山、王悦丰策动了西乌审部队的起义，并带领齐金山、杨玉清、石宝山等到延安学习参观。他忠实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使蒙古族人民逐渐认识了共产党，摆脱了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给蒙古族人民造成的灾难。

1946年8月中旬，曹动之带领三边骑兵团参加保卫边区、扫荡榆林外围敌军的战役，先后解放了镇川堡、响水堡、波罗堡，又围攻横山县城。为争取横山守敌王永清、段宝山起义，他与李坤润同志进城与敌军谈判，由此横山和平解放。

1947年三边保卫战时，曹动之任三边东线副指挥，领导骑兵团和游击队堵击了蒙地叛匪南犯。1948年任三边军分区司令部参谋长。同年被派往东乌审旗与旗王奇玉山谈判，争取了东乌审旗的和平解放。1949年8月中旬，他率部参加解放宁夏战役。9月23日宁夏解放后，任宁夏军区参谋长。1950年4月，调任解放不久的阿拉善旗工委书记。当时盘踞在贺兰山的土匪郭永胜（人称郭拴子）占山为王，与人民为敌，为非作歹，扰害群众，在阿旗散布谣言，挑拨民族关系。7月中旬，曹动之来银川参加中共宁夏省第一次党代会。当时郭拴子匪帮不断从贺兰山窜扰阿旗。会议中，曹动之仍关心阿旗人民的安全和生活，即刻返回定远营（今巴音浩特）布置工作后，又马上来银川，听取传达党中央的会议精神。大会刚一结束，他便在7月30日夜由银川动身，披星戴月，翻越贺兰山回阿旗。31日8时许，在樊家营子遭遇郭匪袭击，曹动之当即抛开马匹、行李，销毁了机密文件，与匪徒展开了生死搏斗，终因寡不敌众，光荣殉难，年仅44岁。

（摘自《宁夏文史资料》第十二辑）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背后的支宁故事

周瑞娟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这首儿歌，50岁以上的人应该都会唱，欢快的旋律，朗朗上口的歌词，曾感动了几代人。这首儿歌是1964年由宁夏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编辑潘振声创作的。

1958年，潘振声响应党中央“到边疆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主动报名到宁夏支边，1958年9月25日，他踏上西去的列车，与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95名支宁广播人一起从上海来到宁夏人民广播电台，成为文艺部的一名音乐编辑，当时他只有26岁。潘振声在来宁夏之前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编辑，那时的他就已经是全国小有名气的儿童音乐作曲家了。

1963年3月5日，毛主席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像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一时间，在全国各地都掀起学习雷锋的热潮。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约宁夏人民广播电台的潘振声，为全国的少年儿童创作一首学雷锋的儿歌。写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呢？潘振声一直都在想这个问题。有一天，在一个小学门口，他看到放学时，有一名年纪较大的交警帮助疏导交通，保护孩子们过马路，他觉得孩子和警察之间的内容可以放到歌曲里，但他却找不到警察和孩子之间关联的桥梁。有一天，他在老大楼的十字路口，远远的看到，一个戴红领巾的孩子给交通警察岗里值勤的警察递了一个东西，那

名警察俯下身和孩子说了些什么，他跑上前一问，是孩子捡到一分钱交给警察。这名警察说：“孩子们捡到钱或东西都喜欢交给警察。你看，我这里有一个小盒子，里面放的都是孩子捡到的钱，有一分钱，也有五分钱。”这不就是儿童与警察叔叔之间友爱互动的桥梁吗？创作人物之间的关联终于找到了。潘振声高兴地一路小跑回到电台录音间，坐在钢琴边，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写出歌曲《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写好后，寄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喇叭》栏目组，由《小喇叭》节目反复播放、教唱，很快红遍祖国的大江南北，几乎所有的少年儿童都会唱这首歌。美好的音乐形象滋润和启迪着几代少年儿童的心灵。50多年来，这首欢快的儿歌成为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潘振声也因此得到了一个“一分钱爷爷”的雅号。现在这首儿歌曲谱的手稿，还陈列在上海公安博物馆的展厅里，手稿后被国家文物局定为“现代革命一级文物”。

1978年，改革开放元年。有一天，潘振声收到了一位词作者寄来的歌词，“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那青翠的山林里，这里有红花呀这里有绿草，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嘀哩哩哩哩嘀哩哩……”读着这首诗情化意、声色俱佳的歌词，潘振声的心如同在春天的原野上欢快奔跑。他想，刚打倒了“四

人帮”，全国人民从压抑的精神桎梏中解放出来，的确需要一首清新、自由和欢快的歌曲来抒发全国人民的情感。想到这些，他一夜无眠，用了一个晚上，就为这首词谱了曲。这首曲子，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经播出，红遍全国。那段时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全国省市台几乎每天都在播放这首歌曲，“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伴着嘀哩嘀哩的优美节奏传遍全国，一时间，无论在大街上，还是在自己的家里，无论大人还是孩子，都在传唱这首好听的歌曲。《春天在哪里》这首歌，取得巨大成功，获得了1978年中国唱片总公司的“金唱片”奖。这首美丽的歌曲，为改革开放的起始年，谱写了一曲最优美的旋律。

40多年过去了，可以说，有孩子的地方就有这首歌，有华人的地方就有这首歌。这首歌也深受外国小朋友的喜爱。许多外国童声乐团来中国表演，这首歌都是保留的经典曲目。《春天在哪里》是全世界留传最广的一首中国儿童歌曲，不但让许多人知道了潘振声，也让许多人知道了宁夏，知道了中国。

来到宁夏后，潘振声经常与记者一起走基层，到石嘴山工矿企业，还到固原、盐池等农村采风，他很快就喜欢上了宁夏“花儿”。但他发现传唱的许多“花儿”曲调并不完整，有的“花儿”大家只会唱一两句。为了便于这些民歌传承和发展，潘振声经常骑着自行车，

走村串户，寻找民间“花儿”歌手，对“花儿”进行摸底调查，让歌手演唱，他来记谱，再进行加工，抢救性地记录了即将失传的一些民间“花儿”。那段时间，他对宁夏“花儿”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交了很多农民歌手朋友，搜集了许多宁夏当地的“花儿”民歌，并收集成册。正因为他精准地把握了民族音乐与时代特征在音乐中的结合点，他创作的宁夏民歌和儿童歌曲才受到听众的广泛欢迎。

他改编了宁夏民歌《幸福大路共产党开》《数花》等民间歌曲。还为吴忠回族地区的民歌《船工号子》、海原回族地区的信天游《上河里鸭子下河里鹅》编曲，让传统的“花儿”赋予现代音乐的节奏与旋律，朗朗上口，便于传唱。上世纪60年代，潘振声改编的《数花》风靡了整个宁夏川，《歌唱宁夏》《我的家乡宁夏川》深受当地群众和专业歌手的喜爱。《数花》这首歌2014年还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

宁夏这片黄土地是音乐创作的热土。第二故乡宁夏与家乡上海青浦一样，给潘振声带来了无数的创作灵感。潘振声曾经说过：“宁夏给我的太多，为我的音乐创作带来了动力和灵感，我热爱这块土地。”在宁夏生活工作了33年，他为宁夏留下了100多首民歌，丰富了宁夏民族音乐的宝库。

（作者单位：宁夏广播电视台）